

中国历史

知道

首先，不知道是可惜的。区区五尺之躯，不以文化群峰作为背景，只是一种无觉无明、平庸卑琐的生理存在。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，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谁，对此，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—种荣辱感。

但是，紧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又必须提防人们对于文史知识的沉溺。沉溺，看似深入，实则是一种以文化名义制造的灭顶之灾。中国明清之后一直有一批名人以引诱别人沉溺来谋生，很不道德。因此，必须在文化的群峰间标划一些简明的线路，在历史的大海中铺设一些浮标的缆索，使人们既领略山水之胜又不至于沉溺。这种做法用一种通俗用语来表述，就是不必知道得太多、太杂、太碎、太滥，只须“知道点”。

下

邱立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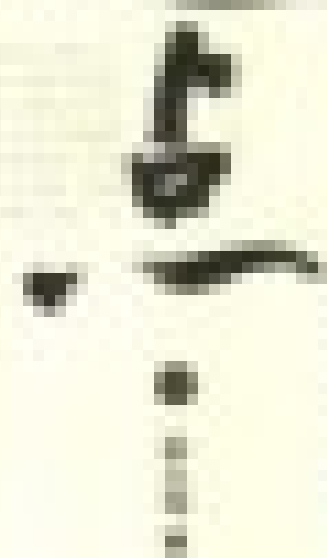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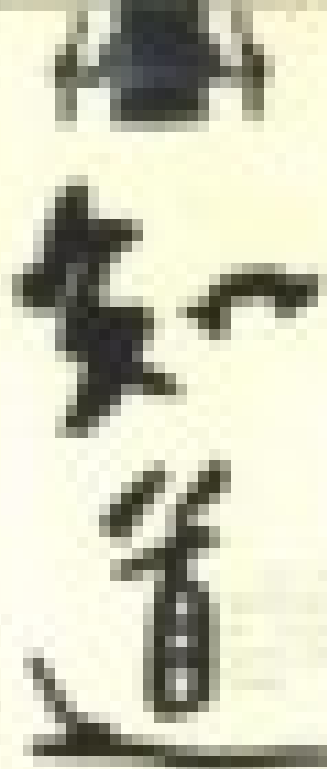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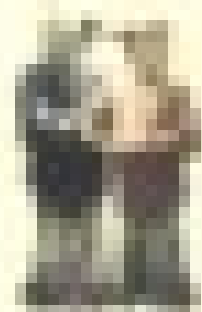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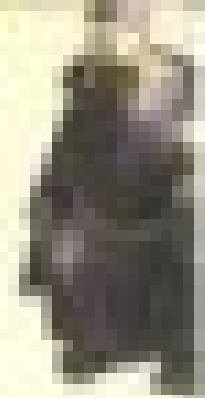
余英时题



雨序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中国历史





K209
93

中国历史

知道点

首先，不知道是可惜的。区区五尺之軀，不以文化群峰为背景，只是一种无觉无明、平庸卑琐的生理存在。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，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誰，对此，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—种荣辱感。

但是，紧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又必须提防人们对于文史知识的沉溺。沉溺，看似深入，实则是一种以文化名义制造的灭顶之灾。中国明清之后—直有—批名人以引诱别人沉溺来谋生，很不道德。因此，必须在文化的群峰间标划—些简明的线路，在历史的大海中铺设—些浮标的缆索，使人们既领略山水之胜又不至于沉溺。这种做法用—种通俗用语来表述，就是不—要知道得太多、太杂、太碎、太滥，只须“知道点”。

邱立坤 著
余秋雨 序

序
余秋雨題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道点中国历史 / 邱立坤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221-06323-0

I. 知... II. 邱... III. 中国—历史—青少年读物
IV. 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7195 号

知道点中国历史

著 作 人: 邱立坤

责任编辑: 王长春

封面设计: 潮 也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(550001)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221-06323-0/K · 733

定 价: 29.80 元 (共二册)

四等人和奥老九

中国数千年历史中，虽先后有华夷之别，土族与寒族的对立，地方和贫民的区别，但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，并将之确立为国家政策的则极少见。元朝分人为四等，可算是一个特例。元统治者以减少各族人民的反抗，维护蒙古贵族特权，在建国之初就采取民族压迫政策。在战争中，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，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对付未征服的民族。最早征服的在地位上就比后来的要高一些。这样，就逐渐构成了一个民族等级。元代法律将人分为四等：第一等蒙古人，第二等色目人，第三等汉人，第四等南人。四种人又可分为两类。蒙古、色目为一类，汉人、南人为一类。

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正职是汉人和南人无权问津的，即使皇帝想给汉人、南人这样的官职，蒙古贵族也不允许。这条法令就是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而设立的。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当然不肯俯首听命于被征服的汉人和南人。在政府机关中，蒙古人任正职，汉人、南人只能充当副职。如地方上的官吏，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，汉人充总管，回回人充同知，形成定例。同知、总管互相牵制，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。在科举上也有区别，分进士为左右两榜，蒙古人以右为上，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、色目人都算上选，而列为左榜的汉人与南人就要低一级。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，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，而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则递降一级。所

以元代儒生文人牢骚最多。陈高有诗云：“客从北方来，少年美容颜。绣衣白玉带，骏马黄金鞍。捧鞭揖豪右，意气轻丘山。自云金张胄，祖父皆朱璠；不用识文字，二十为高官。市人共咨嗟，夹道纷骈观。如何穷巷士，埋首经卷间，年年去射策，临老犹儒冠。”从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是多么不平。

知识分子升官无门，空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，老百姓则连生命都无法保障。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、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负担，均有不同。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，可蒙古人杀了汉人却不用偿命，只流放到边疆而已。汉人伤了蒙人，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成吉思汗曾颁布法令，蒙古人杀一个穆斯林罚黄金四十两，杀一个汉人只赔偿一个约等于一头驴子的财产。蒙古人殴打汉人，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，不能还手。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，只要出钱埋葬死者，就可了事。汉人、南人不准集体打猎，不准举行宗教活动，不准私藏刀枪箭矢等武器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。

在四等人之外，还有一个十等人的说法，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。知识分子排在倒数第二，仅比乞丐强一点，连强盗和娼妓都不如，“臭老九”的说法就由此而来了。在蒙古贵族看来，汉人和南人无论读书与否都仅仅是俘虏而已，留他一条性命充作苦力就算优待有加，根本不必当人看。蒙古贵族文化落后，只重僧道医工，不知发挥读书人的长处，不对他们大加杀戮就已十分宽大了。

明清时期的内阁与军机处

唐太宗说，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历代稍有作为的统治者，无不如此。他们以历史为鉴，整顿朝政，改革制度，防范地方割据，力图将政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。武将掌握兵权，就会有覆国之危；文官掌握军政大权，也会有夺国之祸。如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，就成为一个令历代皇帝头痛的问题。到了明清，皇帝吸取数朝兴亡的教训，先后设内阁和军机处，其中军机处发展为皇帝专制的极端产物。

明初尚设有丞相，自从胡惟庸涉嫌谋反被处死之后，朱元璋便不再设丞相之位，惟恐大臣专权，威胁社稷根本，遗害天下苍生。但以一人之力，日理万机，也实在不堪其苦。无奈，朱元璋置华盖殿、谨身殿、武英殿、文华殿、文渊殿、东阁等大学士，作为顾问，帮助处理政事。

朱棣即位后不愿信任前朝旧臣，在明太祖的基础上专设内阁，备有大学士数名，任用亲信佐理政务，与外朝的六部相抗衡。内阁大学士核签奏章，票拟敕旨，讲论经史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，但其本身官阶不过五品，远在各部尚书、侍郎之下，资望亦甚浅薄。

明朝中期以后，内阁大学士地位日益尊崇，入阁学士均出身翰林，且兼任各部尚书或侍郎，加官至一品，事实与宰相无异，六部尚书也得俯首听命。因此，才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以

大学士身份主理朝政十年，又有奸相严嵩飞扬跋扈，荣极一时，不可一世。

明内阁此后权力愈大、地位渐高，与前朝丞相无异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威胁到皇权。因此，清朝初期虽沿用内阁制，大学士仍有草拟诏旨之责，且品级又升为正一品，勋高位极，实权却大不如前，几乎名同虚设，以至官拜大学士成了明升暗降或赐恩养老的方法。到雍正时便又出现了军机处。

军机处由三四品以上大臣充任军机大臣，随侍皇帝左右，直接听命于皇帝，草拟文件，处理政务。因直接听命于皇帝，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，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。但是军机处没有独立性，既无官署，亦无专官，更无属吏，不是一个独立正式的衙门。军机大臣绝对听命于皇帝，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权力。因此，军机处不会脱离皇帝的控制，便于皇帝掌握实权。这种制度一直为此后历代皇帝所沿用。

绝无仅有的两京制度

万历三十九年考核京官，京师由东林党人主持，浙、齐、楚等首领多被罢黜；南京由浙党等主持，东林党人尽遭排斥。一个朝廷怎么会同时在两个地方考察官员呢？原来，这是由于明朝有一项独一无二的两京制度。两京分别为南京和京师即北京。要说各国都城的数量，明朝也不为多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都城各设一套中央机构，且多有相同之处，彼此独立，各不统辖。两京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。

明朝立国之初，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。1368年，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，并建都于此，改名为南京。此时朱元璋还有向北迁都的打算，不过他理想中的京师是开封，所以暂且将开封府称北京。但后来，朱元璋乐不思蜀，渐渐淡去了迁都开封的念头，遂去掉开封的“北京”称号，改“南京”为“京师”。

燕王朱棣在朱元璋去世后从北平发动靖难之役，攻占京师，夺取帝位，初时也定都南京。此时蒙古族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社稷安危，而北平“地势雄伟，山川巩固，四方万国，道里适均”，若迁都于此，即可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威胁，又可以占据有利地形，控制南方各地。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，并大规模修筑北京城，做迁都的准备。

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，并改北京为京师，同时复原南京的名号。

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

城地位，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。南京和京师一样，设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五军都督府、翰林院、国子监等机构，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。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，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，合称二京府。

不过，南京各机构设员较少，管辖范围也仅限于南京。虽品级与北京各官相同，权力却大大不如。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，也往往是一种贬斥。明中期以后，党争激化，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。一时之间，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。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，互相贬斥，针锋相对的情况。

皇帝的称呼

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自以为德兼三皇、功盖五帝，便确定了“皇帝”称号，并且称自己为“始皇帝”，子孙后代世世相传，二世、三世至万世以至无穷。“皇帝”称号的确立，只是古代帝王在称呼上神话自己的第一步。此后各朝各代又有许多新的花样，所以古代皇帝的称呼今天表面上看起来就有些混乱，实际上却是有着一定的规律。

自夏商周以来，全天下的君主称为“天子”。秦始皇在创立了“皇帝”的称号以后，仍然保留了“天子”的称号。所谓天子，意思是说，天犹皇帝之父，地犹皇帝之母，皇帝即天地之子，替天行道统治天下。皇帝自称“朕”，谦称“寡人、不谷”，也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。秦始皇之子胡亥继位称二世，遵从了秦始皇当年立下的规定。

249

典章制度

谥号

皇帝除了名号以外，生前死后各有一些其他的名号，生前加尊号，死后加谥号。谥号相传为周公所创，也就是根据历代帝王生前事迹、功过等给予的一种号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都广泛地使用谥号。秦王政称帝以后，认为谥号是子议父，臣议君，不成体统，遂废除了谥号。到汉代的时代才又恢复起来，并为以后历代沿用不绝。

谥号大致可以分为褒扬、批评和同情三种。表扬皇帝功劳

的有：经纬天地为文，布义行刚为景，柔质慈民为惠。批评的有：乱而不损为灵，好内远礼为炀，杀戮无辜为厉。表示同情的则有：恭仁短折为哀，慈仁短折为怀，在国遭忧为愍。

比如汉高祖之子即位后，为人柔弱，国家大事都由吕后决定，吕后虽然任用自己的亲属，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黄老无为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政治上比较清明，所以后来皇帝被谥为“惠”，史称汉惠帝。此后两朝则先后谥为文、武，即汉文帝、汉景帝，这两位皇帝当政时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富足，史称“文景之治。”

东汉灵帝时，宦官专权，朝政昏乱，但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动乱，故谥为“灵”。隋炀帝杨广则奢侈荒淫，穷兵黩武，破坏礼仪，遂谥为“炀”。周厉王杀害无辜，不许大臣进谏，禁止人民议论国事，后谥为“厉”。表示同情的如西晋怀帝、愍帝、东晋哀帝。这几位皇帝基本上都是年幼即位，国家大权为大臣所把持，后世表以同情，故谥为“怀”、“愍”、“哀”。

庙号

帝王死后后代在宗庙祭祀时又追尊一种称号，是为庙号。庙号从商代就产生了，如太甲为太宗，武丁为高宗。按规定，各朝第一代皇帝的庙称“祖”，有太祖、高祖、世祖等，以后则一般称为“宗”，有太宗、世宗、穆宗等。这样，一个皇帝死后，即有庙号，又有谥号。例如刘邦的全号是“汉太祖高皇帝”，刘恒的全号是“汉太宗孝文皇帝”，刘彻的全号是“汉世宗孝武皇帝”。但是，到了明清，非第一代皇帝也有称“祖”的，如明代朱棣为第三代皇帝，他的庙号为“明世祖”，清朝顺治帝也非开

国之君，也被称为“清世祖”。

尊号

谥号和庙号都是死后才有的，一个用于评价功过，一个用于祭礼。从唐代起，为了神化皇权，皇帝又开始使用尊号，并且是在生前就已经开始使用。不管皇帝是圣明君主，还是迂腐昏君，乃至荒淫残暴，都可以加上大圣大德的尊号，并且尊号有愈来愈繁的趋势。唐太宗李世民尊号为“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”，谥号为“文皇帝”，庙号为“太宗”。唐懿宗在位时罢黜贤良大臣，任用奸佞小人，乃至天怒人怨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昏君，生前尊号竟然为“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”，比其祖宗李世民尤有过之。以后历代又越加越多，如清圣祖康熙的尊号多至二十三字，为“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”。这样的尊号完全成了赞美词的堆积，除了为皇帝歌功颂德，美化、神化和麻痹皇帝之外，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。

年号

从汉武帝以后，皇帝开始使用年号，以后每逢新君即位均更改年号，称“改元”。汉武帝即位第一年，年号为“建元”。以后的三十六年里，每隔六年改元一次，计有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、元鼎、元封等六个。再往后每隔四年改元一次，计有太初、天汉、太始、征和等。至此，汉武帝一共使用年号达十个之多。此后历朝皇帝年号使用时间不等，有数年的，甚至达几十年的。明代以后，皇帝在位期间基本只用一个年号。如朱元

璋时的洪武，朱棣时的永乐，清高宗时的乾隆。

后世称古代 的皇帝，唐以前一般用谥号，如汉武帝、隋炀帝等，此时谥号一般都能简明扼要地评价皇帝一生的功过得失；唐以后则用庙号，如唐太宗、宋太祖等；明清以后，由于一个皇帝一般只使用一个年号，因此年号也常用来指称皇帝，如万历、康熙、雍正，此时皇帝的庙号、谥号和尊号反而鲜为人知了。

谁是宰相？

谁是宰相？这个问题看似荒谬，其实不然。历代有丞相、相国和宰相各种称呼，甚为混乱，许多人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同一个职位，只是称呼不同而已。其实，宰相与丞相和相国不同，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实际的官职，只是对位于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大臣的泛称而已。而从秦始皇创三公九卿制度一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，“丞相”在多数情况下就一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官职，当他掌握实权的时候，就等于宰相；不掌握实权时，就只是一个虚衔，地位虽高，却无实际职务。

宰相称呼屡经沧桑、多有变化，反映了皇权和相权激烈竞争的历史事实。秦始皇草创三公九卿制度，到汉朝以后逐步得到完善。刘邦夺取天下，萧何立下大功，可谓劳苦功高，于是被任命为丞相，并尊称“相国”。此时丞相仅一人，掌握军国大权，位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萧何之后，曹参、陈平、王陵相继为相。但到了吕后掌权时，就增加了一个丞相，分别称左丞相和右丞相，以右为尊。吕后增加丞相数目是为了分割丞相权力，使之互相牵制、彼此监视，无形中就加强了皇权。

汉武帝即位后，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汉武帝好大喜功，对权力有极大的欲望，无法容忍地位尊崇的丞相在下面约束他的行为举止。他召集了一批文学贤良之士，任命为尚书，随侍左右，以备顾问，并帮助起草诏令，商议国家大事。权力渐

渐集中到地位低微的尚书身上，丞相地位虽高，却无决策权，只有听命行事的份儿。到了东汉，更是成立了尚书台，专门负责起草诏令，决策军国大事，丞相反成虚职。大臣要参预管理决策国家大事，非加“录尚书事”衔不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大臣中只有加上“录尚书事”衔的人方可称得上是宰相。

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，到唐朝的时候，三省六部制日渐完善起来。中书省负责决策，门下省审议决策，有权驳回中书省的决策，尚书省则负责执行，三省互相牵制。此时可称为宰相的人就大大增多。中书省有中书令二人，门下省有侍中二人，尚书省有左右仆射二人，这些人都是宰相，他们集中在政事堂中，组成议事机构，共同决定国家大事。众多宰相之中，又以一人为首，称为宰辅，奸相李林甫、杨国忠均曾担任过这一职务。从一个宰相到多个宰相，避免了一人专权独断的局面，是历史的进步。丞相只作为优礼大臣的崇高官位，不甚假以事权。

一直到南宋孝宗以后，才又采用左右丞相名称，辽金元亦同。宋元朝时国家权力集中到中书省，中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丞相，其助手参知政事则为副相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，仍然沿用元朝的制度，设丞相一员。丞相位高权重，与朱元璋集中权力于皇帝一身的理想产生矛盾，于是朱元璋借胡惟庸阴谋作乱之机，彻底废除丞相一职，并约束子孙后代不可再设丞相一职。丞相作为官职至此寿终正寝，但是宰相仍然存在。

明成祖朱棣设置内阁，到明中叶以后，内阁大学士之首称首辅，渐为百官之首，与前代丞相无异，也可称为宰相。清代雍正以后，设军机处处理军国大事，则仅有军机大臣可称宰相。

历代宰相称呼的变化，是皇帝集中权力的结果。皇帝莫不想将国家权力集于一身，但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，不免力不从心，不得已在宫内召集一批地位卑微有学问的人作为顾问，使他们参预朝政，以与外朝的宰相抗衡。但时间一久，宰相的权力不免又转移到这批人身上。东汉的尚书台，魏晋的中书省、门下省，再到后来的内阁学士、南书房、军机处，莫不是这种权力转移的结果。